

浙江宗族村落社会研究

ZHEJIANGZONGZUCUNLUOSHEHUIYANJIU

周祝伟 林顺道 陈东升 著

. 2
2

温州市图书馆

方志出版社



同祝伟
林顺道
东升 著

浙江畲村落社会研究

方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宗族村落社会研究/周祝伟,林顺道,陈东升著.

北京:方志出版社,2001.12

ISBN 7-80122-724-7

I. 浙... II. ①周... ②林... ③陈... III. 氏族—
村落—农村社会学—研究—浙江省 IV. K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7140 号

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角门北路甲 8 号院 1 号楼 106 室)

通讯信箱:丰台区西罗园邮电局 7713 信箱 (邮政编码:100077)

责任编辑:田 蓉

萧山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D32

印张:10.1

字数:280 千

印数:1-1000 册

ISBN7-80122-724-7/K · 359 定价:30 元

目 录

前 言	(1)
-----------	-----

上 篇 村落社会的历史变迁与社会形态

第一章 概 述	(17)
第一节 三泉村概况	(17)
第二节 主要资料简介	(18)
第二章 三泉村的兴衰变迁	(25)
第一节 建村背景考察	(25)
第二节 村落社会的嬗变	(27)
第三章 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下的三泉村	(40)
第一节 太平天国前后人口变化及原因	(40)
第二节 关于谱载“殉难”、“被掳”者的相关 财产分析	(48)
第三节 共同体化：村民反应模式的一种诠释	(54)
第四章 三泉村婚姻关系的族际选择与地域分布	(60)
第一节 通婚姓氏的定量分析	(60)
第二节 表兄妹婚：婚姻关系的一种优先形式	(73)
第三节 婚族的地域分布	(84)

中 篇 村落社会的宗族活动与村落文化

第五章 顺溪陈族的家族源流与宗枝繁衍	(91)
第一节 凤凰山和莲池绛里时期	(91)

第二节 顺溪时期	(95)
第六章 顺溪陈族的生存智慧	(100)
第一节 好山乐水的生活情趣	(100)
第二节 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	(104)
第三节 重视教育的明智举措	(111)
第四节 礼让智勇的处世策略	(119)
第七章 顺溪陈族的婚姻家庭	(128)
第一节 择 婚	(128)
第二节 聘 娶	(131)
第三节 分家和承继	(135)
第八章 顺溪陈族的宗族活动	(140)
第一节 《陈氏宗谱》:传播宗族文化的神圣蓝本	(140)
第二节 祭祀祖先:敬宗收族的重要仪式	(149)
第三节 寻根联宗:孜孜不倦的敦亲睦族活动	(151)
第九章 顺溪陈族的宗教	(164)
第一节 开放和兼容的宗教特征	(164)
第二节 主要宗教崇拜活动	(175)
第十章 顺溪陈氏古屋的文化内涵	(182)
第一节 顺溪陈氏宗祠	(182)
第二节 顺溪民居大屋	(190)

下篇 村落社会的家族文化与乡村社会现代化

第十一章 现代化理论中的“传统”定位	(205)
第一节 “传统阻碍论”的由来	(206)
第二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方法	(208)
第十二章 韩田村的村落家族文化	(213)
第一节 作为区域背景的瓯越文化	(214)
第二节 家族制度与村落认同	(219)

第三节	家族精神与“重商”传统·····	(226)
第十三章	传统对工业化的影响·····	(233)
第一节	文化的比较利益·····	(233)
第二节	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庭及家族·····	(239)
第三节	社会化协作的基础·····	(250)
第四节	韩山村的工业化模式·····	(258)
第十四章	乡村民主化中的家族因素·····	(263)
第一节	家族制度的重构与嬗变·····	(263)
第二节	家族文化对乡村民主化的影响·····	(268)
第十五章	生活消费的文化制约·····	(278)
第一节	传统对城市化的型塑·····	(278)
第二节	人情与社会关系网络·····	(284)
第三节	传统与现代文化的重叠·····	(293)
第十六章	家族文化与现代化的互动·····	(302)
第一节	韩田现象对现代化理论的启示·····	(302)
第二节	村落家族文化的创新·····	(313)
后 记	·····	(319)

前 言

一、选题的依据及意义

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乡村社会是中国整个社会的主要构件,因此,中国的乡村社会问题自 20 世纪 20、30 年代开始就一直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有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加以研究的;主要的成果如金陵大学教授卜凯(J. L. Buck)于 1921~1925 年用了 5 年时间对中国 7 省 17 县的 2866 个农场进行了调查,于 1930 年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1936 年,费孝通对江苏省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作了细致调查,后来写出了为他在学术上赢得终身荣誉的《中国农民的生活——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中译本改名《江村经济》);1947 年,林耀华以小说的形式写成的学术著作《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在伦敦出版(此书曾于 1944 年以《金翼:一部家族的编年史》为题在纽约印行);1956 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人类学系主任 W·R·葛迪斯对费孝通所调查的开弦弓村作了调查,发表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对开弦弓村的再调查》,费孝通自己也于 1957 年开始对开弦弓村进行了追踪调查,先后发表了《重访江村》、《三访江村》、《九访江村》、《江村五十年》等;庄孔韶在经过一年零两个月的实地调查后,完成了林耀华《金翼》的续本——《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探讨、分析了以《金翼》的原型黄村及其所属的县镇这一区域自 1920~1990 年数十年间的沧

桑变化、人事更替和文化遗产;1977年,庄英章完成《林圯埔:一个台湾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一书,该书主要通过研究汉人对林圯埔的开拓过程,探讨了汉人在林圯埔的拓垦过程中,如何适应内在的生态环境与外在的文化环境问题,或者说是内在的生态环境如何影响林圯埔的社会、经济生活,外在的文化环境如何影响并塑造林圯埔的发展方向问题;王铭铭的《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和《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二书,对新型国家制度与传统家族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现代化过程中民间传统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是近年来国内人类学研究领域不可多得成果之一;黄宗智(Philip Huang)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二书,以30年代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研究人员在华北平原33个自然村和长江三角洲地区8个村庄的研究以及黄宗智本人自1983~1985年间在上海附近的松江华阳桥乡的6个自然村所作的实地调查为依据,对近数百年来华北农村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社会演变形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也以满铁资料为主,探讨了20世纪前半期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陈(Anita Chan)、安格尔(Jonathan Unger)、马德生(Richard Madsen)三人合著的《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农民社区的现代史》和马德生著的《一个中国村落的道德与权力》二书,利用对广东陈村的26位村民的访谈资料建构了一个乡村社区的社会生活史,从一个社区的角度展示了60年代至80年代之间中国人所经历的剧烈社会变革与中国传统权力结构的关联性;桑格瑞(Steven Sangren)的《一个中国村社的历史与魔力》,描述了乡村社区的地方史和社会生活在超地方的空间场域中的地位,讨论了地方性的民间仪式活动如何与大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空间联接等问题。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一书,利用田野调查材料描述了林村党支部

书记个人的“生命史”和他眼中的变迁史,力图通过林村的故事来折射和透视中国整个乡村社会的曲折历史。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则重点论述了20世纪初至60年代的中国农村集市、乡镇和中心城市三级市场的发展、变迁和现代化的过程,分析了市场与社会结构、市场与社会习俗、市场与交通、市场与地理状况的内在关系,认为宗族观念的永久存在与逐渐消解的命运取决于其是否同处于一个市场体系之内,同一个市场体系内的宗族间的联系可能会永久存在,而在不同基层市场区域中地方化的宗族间的联系常常受到时间的侵蚀。有的对乡村社会的结构与文化加以研究,而在这一研究中又必然会涉及到宗族问题,这方面的成果如:美籍沪江大学教授葛学溥(Daniel Kulp)在广东潮州凤凰村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利用西方文化人类学派的观点和方法写成的《华南的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1925);英国学者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利用他所能收集到的有关中国宗族情况的二手、三手或更间接的资料,完成了《东南部中国的宗族组织》和《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两部著作,建构了东南中国的地方宗族模式;法国学者劳格文与中国学者杨彦杰、房学嘉、罗勇等人合作,在赣闽粤客家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先后出版了《梅州地区的宗族与庙会》、《赣南地区的宗族与庙会》、《闽西城乡庙会与村落文化》、《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梅州河源地区的村落文化》、《汀州府的宗族庙会与经济》等专集,较详细地描述了数百个客家乡村社区的历史与文化情况。国内的有: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对于宗族组织的形式、功能以及一个人一生中所要经历的各种仪式都作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王沪宁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一书,对村落家族社会在中国社会——历史——文化总变迁中发生的变化、改革开放对村落的影响、村落家族社会的变化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等作了探索;陈礼颂的《一九四九前潮州宗族村落社区的研究》也对乡村宗族村落

社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林济的《长江中游宗族社会及其变迁》以湖北黄州为个案，探讨了明清长江中游宗族社会的村户宗族组织结构及宗族社会在近代的变迁，指出近代宗族社会变迁以消灭族权为必然趋势，但血缘宗族关系与宗族文化并不可能随着族权的崩溃而消灭，它必将长期存在于乡村社会之中；钱杭和谢维扬的《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一书通过大量调查与深入访谈，展示了宗族关系在江西泰和县根深蒂固的现实及乡村基层干部对于宗族社区整合功能的借重；秦晖的《宗族文化与社区整合》一文则针对明清时期东南地区宗族关系与商品经济“同步”发展的史实及改革开放以来东南地区再度出现的宗族关系与市场经济同步繁荣的现象，认为作为“小共同体”的宗族在特定历史时期与特定发展阶段上对个性发展和现代化（个性化）过程具有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体现了某种集体进取精神对突破大共同体羁绊与习俗——命令经济传统模式的积极效应。此外，还有许多关于大范围宗族问题研究和乡里制度研究的论著，也或多或少涉及了宗族村落社会问题，在此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赘述了。

浙江素有注重现实问题研究的人文关怀精神，20世纪30年代浙江大学农学院冯紫岗教授带领该校学生，进行了大量的、可贵的农村调查，其成果有《嘉善县农村调查》、《兰溪县农村调查》以及《浙江八县农村调查》。改革开放以来，对于浙江的乡镇企业、村民自治等方面的研究也卓有成效，但对于浙江乡村社会中的宗族问题却显得相当淡漠，与浙江近年来宗族势力的“复兴”现象极不相适应。其实，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尽管对属于封建迷信之列的祭祖活动严加批判和厉行禁止，但在浙江农村的不少地方此类活动当时就远未杜绝，仅仅是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即由公开而转为秘密的地下活动，并且还出现了村民与当时的人民公社及大队干部玩起捉迷藏的游戏，干部一出现在村口就有负责望风的村民入村通风报信，正在祭祖的人家即马上撤去香烛与祭品，干部一走

又重新摆上了祭品。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农民生活方式、意识形态方面控制的减弱,祭祖这一宗族活动在农村尤其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农村已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并且向另一种大规模的宗族活动形式——续修或重修族谱发展,而且颇为盛行。据粗略估计,缙云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迄今,一县修成的新谱就达100部以上,这些新谱的编修经费完全通过民间自愿的形式筹措,不少老人平时省吃俭用,对于修谱却一捐就是数百、上千元,热情之高非投资建设任何一项工程所可同日而语。此外,海外宗亲或组团或三五相携,回归故土寻根问祖归宗,其情感之真挚亦令人感动至极。如瑞典王子罗伯特·章于1997年10月偕妻子卡特琳娜回到祖先的故土湖州荻港,并前往下昂斜鱼漾祖坟献花祭扫。他在祖坟上挖取一盒泥土,又把随身带来的父亲在瑞典坟墓的一盒泥土埋进祖坟;并说,回瑞典后还要把祖坟的泥土埋进父亲的坟头。当他在荻港看到一卷手抄的章氏家谱时,当即请求将他及他儿子入谱。回瑞典以后,他将这次认祖归宗之行录像在王室和上层社会广为放映,并促使王室在赫尔辛堡市举办“中国日”活动,还邀请湖州市派代表团参加,借以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1998年11月29日《钱江晚报》以《瑞典王子湖州“寻根”记》为题报道了这一盛举。诸如此类的一些活动对于农村的宗族活动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使人们对于宗族这一历史遗留的社会存在显得更加迷惑。

宗族,也称家族、族。《白虎通德论》说:“族者,凑也,谓恩爱相流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天灾与人祸迭起,备受罹难的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在为生存而挣扎的过程中,产生强烈的群体归属感,渴望通过群体内的互助来弥补个体力量的微薄,而封建政权的垂直延伸只限于县一级,形成了社会控制的真空,广大民众尤其是处于社会边缘状态的农民,不仅无法从国家政权中分得群体协作的一杯羹,

反而经常被国家政权抛至由国家机器控制的群体的对立面的处境。因此,原是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制度的孑遗物的宗族,便成了他们的当然选择。这种宗族制度虽非我国独有的国粹,但由于其在其社会控制方面所独具的功能,封建政府出于弥补其由于行政管理资源不足而形成社会统治盲点的需要,对于具有较强社会控制能力的宗族制度往往采取培植政策,对于一些大家族予以旌表和扶助以在社会上起到示范的效应。如果用清人的话来说,就是“天下之治,始乎县”,然“以一邑之大、民之众,上与下不相属,政令无与行,威惠无与遍”,“以县令一人之身坐理数万户口赋税,色目繁猥又倍于昔时”,“虽谨且廉,而其政不举”,“于是里有长、乡有约、族有正,择其贤而才者授之,然后县令之耳目股肱备也。县令勤于上,约与正与长奉于下,政令有于行矣,威惠有与遍矣”(《保甲书》卷三)。加之,宋明以来理学家又从思想和舆论上对宗族制度加以宣扬和倡导,从而使这一制度在我国的民间社会中普遍地发展起来,成为我国历史上民间社会的一大显著特征。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曾针对我国的这一特征指出:“万国有人伦而族制莫如中国之盛,……举地球万国之政教,其能敬宗收族,上数者至知百数十代之世传,旁通者至能合亿万千之族众,其崇祭千数百年之祠墓而以尊祖合群,其聚处一姓有万数千人以敬宗收族。故一族姓中有谱以纪之,如国史;有族长、房长、宗子以统之,如君长官吏;合族房有公产祖赏,则公举人管理之,有养士兴学之典,有恤孤寡贫老病丧之举,其远游异国或异地,必相收恤。……盖大地族制之来至远,而至文至备,至久至大,莫如吾中国矣。”具有这样广泛的社会基础而又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宗族制度在民间社会中获得了顽强的生命力,对外部社会变迁与政治、经济力量的冲击常能顺应趋时并作相应的自我调适。这种宗族制度虽经建国以来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涤荡,作为一种制度虽已不复存在,但作为一种文化在我国的一些乡村村落中却仍然具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在一

定的条件下可能获得强化,对于乡村社会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建设以及社会的稳定将起着作用不同、程度不同的影响,是我们推进乡村城市化,实现乡村社会的现代化所不可回避的问题,对之采取漠视的态度或否定其存在的做法都是不客观的。作为一位有责任感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正视之,对之采取解剖的方法,加以深入的研究,积极发挥其有利于乡村社会健康发展的文化特质,摒弃其封建的、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使之得以升华,为乡村社会的现代化服务。

本书选择浙江乡村社会中的宗族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是因为如前所述浙江近年来引人注目的宗族“复兴”现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浙江的农村改革与发展处于全国的前沿,宗族关系及宗族意识在乡村社会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以及维持社会稳定方面所具有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体现得比较充分和全面。换句话说,选择宗族文化复兴的中心区与当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处于乡村社会现代化前沿的中心地区这一相互重合的区域作为研究对象,有助于我们从宗族文化在乡村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已经或正在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正负效用,来分析、展望宗族文化在乡村社会现代化中的未来命运,为我们正确对待乡村社会中的宗族文化问题提供依据。

二、基本研究方法

(一)古今衔接:历史地研究问题

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也许在所有比较体面的职业中,最为人所瞧不起的职业就是历史研究工作了。虽然各种“戏说”历史的电视剧甚嚣尘上,十分的卖座,但对于学术良心尚未泯灭的历史学者来说,是祸不是福。他们固守着心灵中的那块圣土,无法也无意

从中分得一杯羹。因此,在世人看来他们只是些未被市场经济所开化的“老学究”。经常地,他们会受到诘问:“你所搞的历史研究既然不能转化为钞票,又有什么用?”对于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在两千年前《史记》的作者就已作出了回答,即“通古今之变”,就是说它能够给我们人类的发展以坐标系的作用,使我们能够作出准确的时空定位,就如同航海家在茫茫大海中依靠航海仪谨慎地前行一样。因此,历史学是有用的,尽管由于他的从事者所研究的对象是过去的东西,在现时“经济至上”或者更加直白地说是以钞票衡量价值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在不少世人的眼里,历史学的价值日益逼近于零。即使是历史学的从事者也不乏对其鉴古知今功能持怀疑态度的,他们或者孤芳自赏,将历史作为自家庭院中的盆景,常加侍弄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得赏心悦目的视觉感受;或者像不少历史学从事者那样从事这一行当只是因为它毕竟还可以提供一种谋生手段,评职称、涨工资是其动力,改善生活状况则是其出发点也是归宿,仅此而已。因为他不相信历史除此之外还能带来点别的什么。然而,哪天他走在大街上不幸掉进窨井或者钱包被偷什么的,这时他在潜意识里又很自然地会与过去发生联系,他会自个埋怨自己:“前两天不是还见到这窨井盖盖子被掀起了吗?怎么就给忘了呢?活该自己倒霉!”或者“上次钱包被偷不就因为自己爱瞧热闹,挤进人堆去看人家玩什么扑克魔术吗?不吸取教训,这不又给偷了?能怪谁呢?”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说人是种“怀旧”的动物,他习惯将过去与现在以及将来,尤其是与现在发生联系,也正因为人类具有了这一特性才为其从动物界中脱颖而出多了一种优势。正是这种“怀旧”情结使得它善于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也使得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得以在对创造和发明不断累积的基础上运行,当然其中也会因为种种原因而发生文明被毁,但人类往往能凭借自己对于过去的“记忆”,而在原来的废墟上很快地进行重建。但必须指出的是,人类的怀旧不管是从时间还是空间上看都是绝对地

“就近取材”。从时间维度看,颇有一种有了新疤忘了旧疤的感觉。大家都知道,我们打从娘肚子里出来的时候是有一条脐带与母体相连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脐眼处都曾经挨过一刀,但孩子长大后,谁又会将之看成是个疤呢?从空间维度看,正如老吾老难以及人之老、幼吾幼难以及人之幼一样,在个体与群体、微观与宏观的衔接上经常要发生断路。一个人对于自己所经历的苦难也许会铭记一生,但对于别人的不幸遭遇,在当事人面前表示同情之后也就抛之脑后了;慷慨大方些的也许会陪着滴几滴眼泪,但眼泪滴过之后,也就完事了,不至于让泪痕总是留在脸上、烙在心中。如何在个体与群体、微观与宏观之间架构一条通道,使群体中某一个个体的经历,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成为整个群体共同的财富,使某一区域内某一问题的解决过程成为从宏观上解决同类问题的参照物?使同样的或类似的问题获得圆满的解决?这就要求我们将历史即自己的过去、别人的过去以及大家的过去都转化为自己的和整个人类的财富,换句话说,别让任何一个人白活了、让任何一件事白发生了。历史上在我国南方乡村社会中发生的宗族械斗与当代乡村社会民主化进程中发生的偏差之间,难道没有一种逻辑联系?马克·布洛赫曾诘问:“为了正确把握当今世界,我们想了解清教运动和天主教改革,又想了解那些距今不远却昙花一现的思潮和情感,几百年过去了,然而,谁敢断言对现实来说前者的重要性远远低于后者呢?”

(二) 科际整合:解决“瞎子摸象”引起的困惑

在印度,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的是:印度某地有六个瞎子,有生以来从未见到过大象是什么样子。有一天,他们决定相约去见识见识大象。他们来到大象跟前,其中的一位摸到了大象的胸部,他说大象像堵墙;第二位正巧摸到了大象的耳朵,他觉得大象像把扇子;第三位抱住了大象的腿,他认为大象应该像根柱子;第四位抓

住了大象的尾巴,于是他坚信大象像根绳子;第五位摸到了大象的鼻子,他惊喜得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原来大象像条蛇。最后一位摸到了象牙,他告诉他的同伴,大象毫无疑问像支矛。于是,六位瞎子便各执一辞,坚持己见,谁也无法说服谁。即使我们有着明亮的眼睛,但限于自己的视野和知识结构,又何尝没有或不会遇到诸如此类的困惑和窘境? 一个有经验、懂得合理安排的老农,他往往在种好自家责任田的同时,利用农闲去干些“副业”,用“副业”挣来的钱作为农业生产的追加资金,从而使责任田中的农作物长得更好、获得更高产。这个道理虽然很简单,但要将其落实到每个学者的具体研究工作中并非易事。我们传统的研究工作在学科之间有太多的人为畛域,自己老实本分不越雷池半步,也不许别人插进一根针、洒进一滴水。这种研究传统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已经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并且在越来越复杂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面前已成为取得科学的研究成果的羁绊。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莫罗曾经说过:“历史是社会科学对过去的投影。”在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由以前单纯的王朝更迭史到今天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科技史等等,历史上的事物无不成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之际,历史学家又怎能如同以往那样再固守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呢? 在历史学的研究领域首先获得拓展的西方史学界,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认识到社会学和人类学对他们的工作所能做出的贡献,并且已经从中受惠。同时,他们也同样相信历史能够为社会学和人类学增添极为重要的新领域,即时间领域,而且一般都承认社会学和人类学对于这一领域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国内历史学界的学术研究方法较多地受传统史学尤其是乾嘉学风的影响,将历史学归结为纯粹的史科学。因为他们所要研究的是一条条“死”的史料,所需要的方法仅是考证,因此需要的是目录学、校讎学、版本学等知识,而无需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 and 研究方法。而今天,所要研究的对象是一个个“鲜活”的

或者是曾经“鲜活”的事物，仅仅依靠目录学、校雠学、版本学等知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研究工作的需要，在这里考证不是目的而是一种基本的辅助手段，目的是要通过分析所要研究对象的来龙去脉及其内部结构以获得正确的认知。

三、基本框架和基本内容

本书由上、中、下三篇组成，每篇分别以一个村庄作为个案，对浙江宗族村落社会的历史变迁、社会形态、宗族文化及其在乡村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诸问题进行了考察与探讨。

上篇以兰溪市三泉村作为个案，利用该市现存同治年间编绘的鱼鳞图册及民国五年（1916）所纂修的《东鲁唐氏三泉族谱》、明代以来兰溪县历次所修地方志作为主要资料，参以包括正史在内的其他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研究了乡村宗族村落社会的历史变迁及其机制和历史社会形态。本篇包括第一至第四章共4章。第一章，概述。主要介绍了所要研究的个案——三泉村及藉以展开研究的两种主要资料。第二章，通过对三泉村唐氏家族历代人口的发展过程与人文状况、婚姻状况、生态环境变迁的对比研究，考察了三泉村建村背景以及村落社会兴衰变迁的过程和发生这一变迁的机制问题。第三章，以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三泉村的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对三泉村在这场运动中“被掳”与“殉难”人员人数及其地产状况的考察，结合村域内流传的相关口碑史料，探讨了三泉村村民对太平军的态度及表现，并根据对该村公众社团及其产业的统计分析，认为山村宗族村落社会的共同体的基础是三泉村各阶层共同参与抵制太平军这一独特反映模式的基础。第四章，根据族谱统计了与三泉村进行联姻的姓氏，在有联姻关系的106个姓氏中有9个姓氏占了统计总数的27.4%，根据对通婚对象之间关系的考察及数量统计，认为表兄妹婚是三泉村婚姻关系